

两边各有一溜禅房，西禅房为生产队库房。父亲在这座寺庙改造的分销社里一待就是5年。

那时候的供销社，大部分商品都凭票供应，如买棉花要棉花票，买布要布票，买点蛋糕之类的要粮票。少数民族购买茶叶要有茶叶票。供销社除了经营日常吃喝及生活必需品外，还经营那个年代的“奢侈品”。20世纪六七十年代，自行车、缝纫机都是年轻人结婚时的必备商品，也是紧俏商品，群众购买这些，也需要凭票证才能购得。除了以上物品要票证外，其他醋、酱油、服装、鞋帽等日用杂货均敞开供应。父亲为了给老百姓多解决点茶叶之类的商品，总是不停地争取货源，尽量满足群众所需。

在我的记忆里，父亲总是一年四季穿一件四个兜的工作服。在我们兄妹四人中，妹妹弟弟小，只有我时常跟在父亲身边，每天一放学，就家也不回地到分销店玩上一会儿，等父亲下班后才和他一起回家。

那时，父亲所在的分销店常常是上午营业，下午收购生猪。每到下午两点多，四面八方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赶着自家养殖的生猪到供销社出售，这也是父亲一天当中是最忙的时候，除了对每头生猪定出等级，还要给出合理的价格。根据当年的相关规定，对交售三头以上生猪的农户，奖励一辆自行车购买票。发放自行车票也是一件极为忙碌的

业务。普通农户很少能一下子上交三头生猪的，为了能得到一张自行车购买票，有的农户联合在一起，凑够三头生猪领取一辆自行车票。如此质朴与纯粹的邻里情感，至今都让人感怀。

虽然规定有营业时间，但到了晚上仍有周围村的群众到分销店扯市布、倒醋、打酱油的。不论是出售鸡蛋的还是购买生活用品的，父亲都热情接待。直到晚上八、九点才能打烊关门。到了晚上，分销店大门从里一关，我常常和父亲在空荡荡的寺院里值班。起初，每到半夜醒来，总有一种阴森森的感觉，仿佛大殿两旁的四大金刚龇牙咧嘴地向我走来。为了减轻父亲的工作量，我常帮着父亲对账，打开那一摞票证，与父亲核实那些收购生猪的数字。日复一日，在父亲的教导下，我打得一手好算盘。

1966年秋天，我在邻村读五年级，每天往返十多里，中午不回家，谁知又遇到一种巧合，我三叔所在的分销店就在学校的隔壁。每到中午，我就到三叔店里吃顿饭，有时三叔还能给我点零花钱。这年冬天，“破四旧”开始，村里两位大队干部领着红卫兵造了大庙的反，把大庙里的泥塑像推倒，把庙里的账册烧毁，大庙被拆毁，接着用大庙的材料在原址上盖了分销店。而那口康熙年间的大钟也被卖到供销社的收购站。

1970年，我开始读初中，就这样离开了父亲和三叔的分销店。

高中毕业后，我重返沙尔营公社务